
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五讲

李 新

ZHONGGUO
XINMINZHUSHUYI
GEMINGSHIWUJIANG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五讲

李 新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倪进云

封面设计：杨守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五讲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3×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91 千
1981 年 7 月第一版 198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200 册

书号：3118·187 定价：0.77 元

中国近代史
第一版

出版说明

一九六三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同志，曾在四川成都和重庆作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术报告，一共讲了五讲。这个学术报告，史料丰富，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受到当时听众的欢迎。稍后，主持讲学的单位将李新同志的讲稿整理印发，很快被索取一空。现在，我们应读者要求，将当年的讲稿请作者审订并作了必要的注释出版，供党史和现代革命史教学人员参考。

但是，这毕竟是十七年前的讲稿，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从我的讲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在某些问题上有‘左’倾的观点”，“受时代的限制并有时代的烙印”。为了尊重历史，也为了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我们将讲稿按原样印行出版。

一九八一年六月

序 言

一九六三年秋，我应四川省高教局的邀请，到成都和重庆讲革命史，讲了五讲，并在座谈会上解答了一些问题。讲完之后，听众（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教师，也有地方上和部队里的宣教干部）要求印发讲义，我没有答允。但后来在广大听众的坚决要求下，主持这次讲学的单位，还是把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铅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讲学成了我这个“黑帮”的重大“罪行”之一。讲课内容受到无情的“革命大批判”。我虽然被迫作过一些检查，承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但对讲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我始终没有认错。因此，我的思想在当时是属于顽固不化的一类。十年内乱过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根据过去的听众和后来的读者要求，希望把我回川讲学的记录稿出版。我从一九五三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党史开始，有关党史的讲稿和讲课记录稿积累很多（现在大都散失了）。我从来都认为这些东西没有出版的价值，有时偶尔翻阅一下，看到其

中不少的材料和观点都有错误，就感到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粗糙，很觉惭愧。所以我一直不肯也不敢把自己的讲稿拿出来发表。现在我为什么同意在四川出版这本讲稿呢？上述的经过已经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还要补充几句：对我的批判于我也是有好处的。他们使我认真地重读了我的讲稿。重读的结果，我发现我的错误和他们的批判恰恰相反。他们批判我有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其实在这方面我并没有错，我拒绝检查这方面的错误是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持真理的正确立场。难道我就没有错误吗？错误是有的。从我的讲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在某些问题上有“左”倾的观点。产生这些“左”倾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但同时也反映了时代思潮对我的影响。我的思想和大多数人的思想一样，总是要受时代的限制并有时代的烙印的。为了使我能深刻地接受教训并使读者也能因此得到启发，我特地把我的讲稿按原样印了出来，只在字句上作了些不失原意的技术性的改动。这不是为了偷懒，也不是为了表示我“一贯正确”，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自己过去的真实思想究竟怎样？错在哪里？自己的思想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对讲稿中，我现在认为是明显错误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注释，但并不改原文。希望读者，特别是四川当年的听众，无论对讲稿中的错误和现在注释中的错误，都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我的进步。我虽然拒绝了当年的“革命大批判”，但对于今天同志们的批评则是诚恳

地欢迎的。我深知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人的思想就不但不能前进，而且是一定会落伍的。

四川，是我的故乡。故乡这个字眼，对每一个羁旅在外的人都有一股特殊的魅力，何况我自投身革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它的怀抱中呢？一九六三年我回川讲学，是在同它阔别了二十六年后又重逢的喜悦中和吴老（玉章同志）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次在四川出版这本讲稿，也算是寄托一下，我自一九六四年陪同吴老回川后，一别又是十六年的思乡之情吧！

我热爱四川，那不仅因为它是“天府之国”，山清水秀，如峨嵋、三峡尽寓于它的怀抱；谪仙人杰如李白、苏轼尽出自它的哺育；更重要的是它在近现代革命史上的光荣史迹。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四川人民都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革命先驱和烈士们如邹容、吴玉章、朱德、赵世炎等，他们的英名和革命的业绩，早已为整个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所称颂，成为我们四川人的骄傲。

今天，当我们的祖国走上了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的道路上时，我高兴地看到，四川人民在克服了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困难之后，又走在斗争的前列。我为祖国繁荣昌盛的光明前途而欣喜，更为故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而自豪。我祝愿四川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把巴山蜀水装点得更加美丽富饶！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

者。我深信全世界无产者必将联合起来，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深信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历史工作者看问题主要是宏观的。从历史的眼光看来，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确实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的曙光已经出现，它照耀整个大地的时日必将来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我对他的信仰确是“穷且益坚”、“老而弥笃”。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四川传播得很早，我们四川为马克思主义而殉身的先烈难以数计。我希望我的讲稿，能在我的故乡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多少起一点作用，那我就于愿足矣。

同志们！只有共产主义的事业才是最伟大、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能为这一理想的事业贡献一分力量就是莫大的光荣。我不相信一个人没有理想而能感到生活有意义。最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为人民、为人类的最大利益和无上幸福而奋斗。这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这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让我们为实现这个科学的理想而共同努力吧！

李 新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讲 革命史教学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一、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1 ）
- 二、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是我们当前革命史教学和研究的指导方针……（ 10 ）
- 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一致……（ 15 ）
- 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25 ）
- 五、教学方法问题……（ 32 ）
- 六、努力学习，加强锻炼，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33 ）

第二讲 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 35 ）
- 二、陈独秀机会主义拱手奉送了革命的领导权……（ 49 ）
- 三、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 58 ）
- 四、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69 ）
- 五、党清除了取消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陈独秀……（ 74 ）
- 六、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 78 ）

第三讲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侵略的加紧·····	(80)
二、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87)
三、张、杨执行“剿共”政策的失败及其转变的开始·····	(88)
四、“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92)
五、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94)
六、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胜利·····	(99)
七、红军的东征和回师，“逼蒋抗日”政策的确定·····	(103)
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和张、杨的抗日准备·····	(107)
九、全国抗日运动的继续高涨和绥远的抗战·····	(111)
十、蒋介石坚持反革命的内战政策及其对张、杨的威逼·····	(115)
十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120)
十二、国际、国内的反映和南京反动政府内部的分歧·····	(126)
十三、中国共产党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133)
十四、和平谈判的举行和蒋介石的被释放·····	(135)
十五、蒋介石的报复行为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40)
十六、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44)
十七、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强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	(146)
十八、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成·····	(148)

第四讲 抗日战争时期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

- 一、武汉失守以后的抗战形势…………… (153)
- 二、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动方针及其后出现的
层出不穷的摩擦事件…………… (159)
-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和被击退…………… (170)
- 四、毛泽东同志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82)

第五讲 粉碎美蒋和平阴谋的斗争

- 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三日的报告…………… (190)
- 二、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 (196)
- 三、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区反内战运动
的高涨…………… (206)
- 四、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210)
- 五、国民党对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破坏…………… (216)
- 六、蒋介石一面发动全面内战，一面进行政治欺骗
和镇压国民党区的民主运动…………… (227)
- 七、美蒋和平阴谋的最后破产…………… (232)
- 八、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被粉碎和人民解放战争的
胜利发展…………… (234)

附 录

- 问题解答…………… (236)

第一讲 革命史教学和 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①

我想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教育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一切科学研究也都是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教的课程——党史、现代史或者是革命史都是社会科学，有阶级性的科学。而党史还是阶级性很强的科学。

历史科学从来都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历史学，超阶级的历史学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范文澜同志曾经作过一次讲演，好象还在报纸上摘要发表过。他讲得很好、很生动。因为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大历史学家。中国的许许多多的经史古书，他都博览无遗，所以他就能引经据典地讲。他说，孔子作《春秋》有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这些乱臣贼子就害怕呢？因为他骂他们，不仅当时骂他们，而且要使他们在万古以后留骂名。孔子所说的那些乱臣贼子，就是孔子反对的那些人，就是跟孔子这一派政治见解不相同的那些人。所以他作《春秋》是有目的性的。而且目的性是很鲜明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春秋》这本“历史经典”，是没有阶级性的。现在不是还有人说古史没有阶级性吗？你看有没有阶级性？孔子作《春秋》，政治目

①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现在看来，已不妥贴，不如“为人民服务”恰当。

的性是很明确的，这就是说，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这是很有名的一部史书。他的立场也是很清楚的。他的立场就是“抑刘扬项”。他对刘家不满意，他对项羽是推崇备至的，把项羽描写为英雄，把刘邦写成一个无赖的样子。你看他的政治倾向性明显不明显？刘家当然是地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而项羽是另一派、另一方面、另一个体系、另一个系统的封建统治阶级。他由于对这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满，就去赞扬另外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他是有很明确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的。整个《史记》这部书都是为他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宣传的。不过因为他反对的是当权者（汉武帝害了他，他不满意），所以他用的语言，采取的手法要隐晦些。他不能公开地骂，公开地骂要杀头。但是他的政治倾向性仍然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里面的文章，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歌颂什么，讽刺什么和批判什么。

宋朝的司马光主编了一部《资治通鉴》，这也是中国很有名的史书。《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就是一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书。

“资治”就是帮助管理天下，帮助统治。他编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赵家的天下，教以后那些一辈一辈的小皇帝，读他这部书，以历史为殷鉴，学习历史经验来巩固赵氏的天下，所以就名之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部书，当然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收集了很多的材料。不仅仅有正面的材料，要赵家以后那些皇帝，学习尧、舜、禹、汤、文、武那一套，要学习好皇帝、圣明天子。同时也有反面的材料。因为他为了进行教育，光正面的材料不够，也需要一些反面材料。如哪一个皇帝怎样荒淫无道，怎样相信宦官，怎样相信外戚，结果这个皇帝就垮台了，他的天下就完了。所以他正面和反面的材料都选了一些。他选的材料是

很丰富的，并且是经过很好的鉴别的，很多材料都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他的目的性却是非常明确的。他选择那些材料是为了教育姓赵的小皇帝，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比方说，他这部书里面有个要“爱民”、要行“仁道”的思想。可是他那个行“仁道”、“爱民”并不是真正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为了巩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资治通鉴》这部书，立场、政治色彩是很明显的。

以上这些都是讲的范文澜同志的观点。因为他学问渊博，讲得很好。我这一转，可能就转得不对了。但是基本精神是这样。这都是说的封建阶级的史学家。他们的著作被后来中国讲历史的奉为“经典”，但是他们的阶级性、政治倾向性是很明白的。

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的政治倾向性明白不明白呢？看来好象没有那么明白，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社会科学家，他们都更狡猾。他们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他们甚至于还起来反对过去的封建历史学家，说那些人是为封建阶级说话的，而他们好象是为人民说话的样子。他们装成没有阶级、没有什么立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客观的”——实际上是客观主义的假客观，所以很狡猾。他们做学问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学派，就是胡适学派。胡适派反动史学家们的一切著作、讲演，各种学术活动，中心的目的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前几年批判胡适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读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把他们的面貌揭穿了。胡适本人是这样，他下面的一群喽罗也是如此。比方蒋廷黻，他是胡适派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写了一些书，如有关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的著作等。他的中心思想跟胡适是

一样的，无非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什么侵略，而是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明，使中国近代化了或者现代化了，好象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推动了中国进步一样。虽然他转弯抹角地不敢明明白白地这么说，但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件好事情，带来了文明，推动了中国进步。不然，中国还不知道会怎么落后。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是应该感谢，应该感恩图报的，你还能反对帝国主义吗？所以这是一种买办思想、洋奴思想，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

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证明中国社会完全是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比方那个时候郭沫若就写了一些书，这些书是有作用的，因为它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规律的。那末中国人民的革命就是合理的。所以这种著作，这种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上是有帮助的。

胡适学派他们看见这样的著作当然不满意，因为这跟他们的利益是违背的，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比如胡适学派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现在还活着，在北京历史研究所。他这一派叫做“疑古学派”，即对于古代的东西，对于中国上古的东西抱怀疑的态度。他说应该抱怀疑的态度。资产阶级学者为了表示“客观”，就说历史上的任何东西，只要没有经过证明，就不能相信。这好象是个科学的态度，所以这一派就叫做“疑古学派”。他疑来疑去，找许多的证明，无非是说中国古代的历史都靠不住，尤其是古书上记载的那些传说靠不住，因而“证明”：中国从来没有什么奴隶社会，更不用说原始社会了。既然奴隶社会也

没有，原始社会也没有，那你马克思主义说的什么社会发展规律，当然根本不适合于中国，不合中国国情。他的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表面上说他采取怀疑态度，“客观地”论证和进行考据。他考来考去，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论点，说夏禹王——大禹不过是个虫子。禹字里面不是有个虫字吗？是虫子！哪里有什么夏禹呢？没有！这些传说统统靠不住。说夏禹王是个虫子，说起来好象是个笑话，很简单，可是他有一个很阴险的目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始社会，没有什么奴隶社会，你马克思主义那一套社会发展理论是虚构的。你看，他好象在研究古史，超然物外，其实目的是很鲜明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跟托洛茨基派进行过斗争。托派当时说中国根本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了，中国当时进行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那是不对的。这些，我们讲党史的同志都是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党员和进步的学术工作者，就起来跟托派作斗争，批驳他们。我们正在跟托派作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特别有劲地帮助托派说话。因为他们是搞历史的，似乎很有学问，就这样考证、那样考证，引经据典，说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封建了。托派当时不是说中国封建势力经过大革命以后已经是“残余之残余”了吗？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说中国自秦以后就没有封建了。因为秦朝不是“废封建，行郡县”了吗？我们过去学历史的时候，书上不就是这样讲的吗？实际上他说的那个“封建”根本没有阶级观点，不懂得封建是指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并不是说封王封侯（公、侯、伯、子、男）才叫封建。他们就抓到中国过去这种表面的东西，加以阐发，说秦朝以后中国土地都能自由买卖了，废了封建，行了郡县制度了，因

此，中国根本就没有封建了。既然没有封建，你们又起来反封建干什么？无的放矢！你们搞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对象呢？当然是错误的了。所以他们咒骂我们搞土地革命是“土匪”，是“流寇”。你看，他们在这里好象是在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上是反对我们的土地革命，所以他们的政治性是很明白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当全中国人民都要求坚决抗日作战的时候，中国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按道理，如果他们有点爱国心的话，他们就应该跟大家一起来宣传抗日。不！他们竟起来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为他效劳。当然，他们不敢直接起来反对抗日，来给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因为如果那样，大家要打他的。九一八以后，学生游行示威到了南京，就打了国民党的官员。那时谁敢说说不抵抗是好的，谁就要挨打，所以谁都不敢。于是这些反动的历史学家就讲历史。说什么历史上主张孤注一掷的抵抗不一定就正确。一个人对国家要“负责”，要“老成”，要“忠诚谋国”，不能够“意气用事”。讲到岳飞抗金的时候，他就说岳飞抗金是“沽名钓誉”。因为当时金朝非常强大，如果马上要跟金人决战，宋朝一定要亡国。而秦桧这个人很勇敢，他是“老谋深算”、“忠诚谋国”的。好象秦桧是在千方百计，为保持宋朝的江山、保持中国的领土而“奋斗”。这叫什么话！这简直是汉奸理论。但是这个汉奸理论在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就大肆宣传。所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为反动统治服务是很明白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全国的民主运动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的时候，胡适派的一些历史学家，有一个叫钱穆的。这个人实际上是胡适派，但是他表面上装作不同意胡适的样子。如果说他与胡适派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带封建性。那时全